

# *The State,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Richard Sylla, Richard Tilly, Gabriel Tortella 编

吕刚译

## 国家、金融体制 与经济现代化



剑桥经济学译丛  
JIANQIAO JINGJIXUE YICONG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国家、金融体制 与经济现代化

吕 刚 译  
何泽荣 审校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金融体制与经济现代化 / (美) 西拉, (德) 蒂利, (德) 托特拉编; 吕刚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5

书名原文: The State,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SBN 7-220-05925-6

I. 国... II. ①西...②蒂...③托...④吕...

III. 金融体制-研究-西方国家 IV. F835.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5490 号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引字 21-2001-003 号  
本书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译出

## The State,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国家、金融体制与经济现代化

R. 西拉, R. 蒂利, G. 托特拉 编  
吕刚 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韩波 朱兰  
周靖明  
古蓉  
伍登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 @ 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679239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850mm×1168mm 1/32  
12.75  
280 千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5925-6/F·241  
28.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 内 容 简 介

在现代金融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此外，政府也一直需要大规模的融资。但政府与私人团体不同，它拥有征税的权利，并且较之于私人经济实体具有更大的借贷能力和偿还能力。此外它还可以通过立法和政府监管金融市场促使其发展。

本书以大量的章节重点探讨了一批欧洲国家和美洲国家150年金融发展的历史，阐述了金融在经济变革中的关键作用。经过对很多国家的研究表明：金融制度的发展是不尽一致的，相反各式各样的金融体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应运而生并且能够保留下来。从前工业时代就开始对政府最早在金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并未持续到工业时代的编史工作中。因此，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将这些逐渐发展起来的认识和了解系统地加以归类，旨在通过对现代金融体制发展史中大量文献的比较和分析，来阐明国家在形成这些金融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且使之重新发挥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过的这些作用。

本书对金融编年史做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并且也必将引起经济学家和研究经济和世界史的专家学者的广泛兴趣。

## 前 言

早在五年前（1993年）出于共同的志趣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希望能出一本以比较金融体制为主题的专著。这个主题就是围绕政府在世界各国金融体制发展过程中以及在联系国家财政与私人融资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论述。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世界各国的情况，我们在世界各地聘请专家学者，广招贤士。在实施该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开始认识到这本书可以将三个方面的研究融为一体——金融历史，经济发展和国际比较经济。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正是久负盛名的经济历史学家——朗登·卡梅伦（Rondo Cameron）论著中十分鲜明地反映出的特点。鉴于我们和我们的合作者经常从朗登·卡梅伦的著作中旁征博引，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此谈谈他的影响。朗登·卡梅伦著作中的三个方面之所以备受当今世界人们的关注，首先是他本人在1961年发表的《法国与欧洲的经济的发展》一书中指出：私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能够非常富有成效地、十分清晰地用于分析和阐述比较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的总体情况。这一观点可以从大量的档案资料中加以证实。此外，在他随后发表的论著《工业化时期的早期银行业》（1967）和《金融业与经济发展》

(1972) 中以朗登·卡梅伦为首的经济学家提出了银行是该时期的中心，进而强调了它的重要性。同时全面地阐述了金融机构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两本论著的问世，改变了过去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诋毁和轻视金融机构的历史，使得他们很难再有机会对此说三道四了。最后一点，在人们将注意力转向私营经济实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卡梅伦派学者们还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政府干预经济行为予以了抨击。在大萧条和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间，不少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一直对此持批评态度，而卡梅伦派的批评最为激烈。对此，当时颇有争议，其中的某些观点至今仍然莫衷一是，不一而足。

但关键的一点在于：朗登·卡梅伦的著作向我们提出金融体制演变中的若干问题，并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地论证和找到可能解决的相应措施。我们这本书并非处处承袭卡梅伦的思维模式。我们在阐述国家作用的时候偶尔列举一些恰当的例子与卡派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即使我们的结论与卡梅伦的结论不同，我们仍认同他的观点并将我们的结论建立在他的这一观点上，即“金融至上”，比较历史必须看清事物的来龙去脉并指出为什么事情当应如此。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此谨将此书献给朗登·卡梅伦。



## 目 录

前 言 .....	( 1 )
第一章 引言：比较历史的不同视角 .....	( 1 )
第二章 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时期的政治和银行业 ..	( 29 )
第三章 19 世纪和 20 世纪比利时的银行业：比利时总 公司和比利时总银行 .....	( 76 )
第四章 1826 年~1844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银行业自 由化 .....	( 104 )
第五章 19 世纪欧洲银行业：中央银行的作用 .....	( 165 )
第六章 19 世纪德国的公共政策、资本市场和工业融 资的供给 .....	( 189 )
第七章 1850 年至 1935 年西班牙经济发展中银行和政 府的作用 .....	( 220 )
第八章 1893/5~1914 年间意大利的中央银行及德国 模式的混合银行：从共存到合作 .....	( 253 )
第九章 1802 年~1917 年俄罗斯的国家权力和金融： 财政部信贷局和信贷机构的政府控制 .....	( 292 )
第十章 阿根廷银行业起源 .....	( 310 )
第十一章 1690 年~1913 年美国金融体系的形成 ..	( 342 )
第十二章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世界金融业：纽约成为国 际金融中心 .....	( 373 )

# 第 一 章

## 引 言： 比较历史的不同视角

理查德·西尔拉，理查德·蒂利  
加布里埃尔·托特拉

我们越是研究现代金融制度的历史起源和发展我们越容易发现在金融体制发生改变的关键时刻，时好时差，而政府的作用总是至关重要，贯穿始终的。这并不奇怪。早在私营经济实体，如私营贸易、运输、制造业等私人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个体业主和合伙人无法满足企业资金需求，而需要向外界大规模筹措资金时，政府早就开始了这种大规模的融资行为。对这种融资需要的根本原因就是为满足政府政治野心的需要。政府需要不断巩固和扩大他们的权威，将国家的异己分子和敌对势力统揽在国家的麾下，扶持由国家领导、国家财政支持的经济工程。为此作为扩大国家权力



的手段。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有利于对它的竞争国发动战争。然而，政府并不仅仅是需要大规模的融资，它还对很多事情拥有强制征税的权力，以便建立更大的政府信用，使之具有较之于其他私人团体更大的借贷能力和偿还能力。此外，国家还有能力建立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并通过立法和监管使之规范发展。从现代工业时代之初，即从欧洲中世纪到19世纪各国政府成功地运用了上述各种权力来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

奇怪的是，这种源于前工业时代的对金融的发展的了解和认识，即这种对国家作用雏形的了解，并未延续至工业化时代编史工作中。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工业化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商业、农业和金融的发展却屈于从属的、次要的、辅助的地位。政府的作用却退居幕后。很多学者认为，本来就应如此（减少政府干预），也理应如此。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心的转变应归咎于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干涉主义和反对重商主义的传统观念。同时，也应归功于现代经济学家的劳动分工。由此将财政学和私人融资学分成两个更细的学科，各自具有自己的从业者，独立的课程设置，各自的学生、教科书和专业杂志。不过，两个学科似乎彼此没有什么关联。我们当中专门从事金融史研究的人不可能不受到这些主流思想的冲击。一方面，他们要我们去研究一些本身并不重要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东西——工业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将金融学分为两个研究领域——私人融资学和国家财政学。并且各自还有自己的分支学科，而且两者彼此似乎关联甚少。我们多数人研究私人融资学，即货币银行经济学，其他金融媒介、货币和资本市场、利率

和股票收益率。财政学也被分成两个小的分支学科——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二者均与私人融资的相关学科关联甚少。

鉴于金融历史学家们受到这些思潮的冲击，我们相应的战略就是选择一个单纯的领域着手研究。私立银行就是金融机构的一种类型。它的存在贯穿了整个工业化时代。而我们工作的重心则是放在研究在那一时期银行究竟做了些什么；其性质和功能是如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以及银行以什么样的方式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或者是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原因是什么。我们大量的论文、文章和专著就是按照这种思路撰写的。

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之而来的有关研究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文献大量出现。在当时这代表了一个迟到的纠正旧的传统观念的时候已经到来。传统观点认为“货币和银行业”与短期周期性的经济发展联系密切，而与长期经济变化相关甚少。然而，与此同时，金融学、货币经济学以及金融历史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金融学过去和现在所涉猎的领域远远超出了银行学的范畴。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预期理论，信息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大地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机构（如银行）和国家政策改变之间的互动作用，使之成为制度一体化的一种更好的补充手段。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在同一金融体制下的多元化的、多种形式并存的金融机构开始出现了新的生机。这些金融机构包括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货币市场、债券和股票市场，以及证券交易所。

我们在探究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起源的时候，再也不会迷茫无措。因为我们认识到了国家对金融的需

要以及政府目的之重要性。也就是说，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公立或国家银行几乎是与私立银行同时诞生的；国家银行所设立的模式私立银行有时也如法炮制；国家银行逐渐发展成为中央银行，制定政策法规，监控和规范私立银行的金融活动。我们还可以对这一发现赋予一层新的意义。即，私立银行尽管开始在通常情况下作为个体业主或合伙人的身份出现并未受到政府法令法规的限制和干预，逐渐发展成为符合国家的利益，经政府核准并受其监管的经营企业。于是也并不奇怪货币、债券和股票市场最终就演变成了工业和商业融资的主要来源。而这些市场在一开始总是作为政府债务工具的发行和交易市场，稍后市场上才出现了私人债务工具。

在我们研究金融历史的工作中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各种金融制度的演变并非一成不变地按照由产业金融内在机制所决定的统一模式发展。相反，从这些金融制度中分离出了很多分支。在欧洲大陆，金融制度受到各大银行的支配。未清偿债务和股票市场就相对地显得无关紧要了。然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国家，银行发挥的作用并不大。相对而言，大多数的企业融资，特别是长期融资则通过公开债券和股票市场来完成。那么，怎么解释金融体制中出现的差异呢？通常这些差异都是在政府制定和颁布金融法规的过程中以及在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的方式上产生的。

不过，以上这些不同的见解以及我们正在对这些名目繁多的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所做的重新认识还未形成一个连贯的、完整的体系。这也正是我们这本书的目的所在。本书旨在通过比较分析历史来阐述现代金融制度产生的丰富的历史内涵，恢复政府在设计 and 制定这些制度之初曾发挥过的历史

作用。我们再一次重申：工业化时代金融制度的历史不仅仅是银行的历史。并且在这一时期，政府在建立什么是正确的金融立法和监管的先进理念中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地超过了早期的思想。

经济史学家们早就认识到国家通过法令法规始终对金融制度施以影响，例如借助调整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等手段。不过，政府对金融运作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总是不受欢迎的。特别是在处理国家财政事务中，对私营企业的发展中的财务安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以现代化时期早期出现的政府模式为例，那段发展史是在战乱中进行的。那时国家向私人借款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在有些案例中，政府借款致使一些私人财富拥有者遭受了金融灾难，并且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在其他案例中这种不良影响所造成的危害尚能很快被克服。只要我们对历史稍加回顾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间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历史概念，即“金融革命”。它最早在描述 1688 年至 18 世纪中叶的英国“光荣革命”历史中使用（狄克森 1967）。其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资产阶级日益繁荣的重要性，随着上述政府对金融需要的增加而促使了资本财富拥有者的联合。这种状况就导致了欧洲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迅速地效仿这种资本主义模式。比如说通过进一步增加财务账目透明度，提高收益基数。甚至，还有更极端的情况，在经过由财富拥有者把持的政治组织的应允下，扩大使用和征收税款。最终的结果就是强调符合资本家个人利益的，具有吸引力的提供个人资产的形式。这是一种颇具诱惑力的，融利益性、流动性及安全性为一体的提供个人资产的

形式。所有这一切代表了以往长期以来实行的借助强行借款或到期违约来进行货币贬值或没收财产的时代已经结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金融革命的历史最早应追溯到荷兰。因为在17世纪，荷兰是第一个依照资本主义原理建立国家财政的国家。政府可以在经过资产阶级合法代表的审议和批准后享有使用和征收税款的权力，以此来主宰国家的命运。这在当时还是举世无双的。结果荷兰的政府金融需求发展到由各阶层的投资商来满足，不仅仅限于富裕的资本家特权阶层。而当时其他国家却是仅限于少数的特权阶层（德·弗里斯 1976：211—213，218，220）。这种将私人财富的联合，并得到广大市民的认可的实践使荷兰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也使它成为举世瞩目的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肯尼迪 1988：101—2）。

随着荷兰在世界舞台上的闪亮登场，同时伴以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的国家财政金融机构的问世，宣告了“金融革命”的结束，惟余金融进化。荷兰人无能利用它在金融体制方面的捷足先登为其在工业化时代抢占优先地位奠定基础，其中的种种原因我们不必在此赘述（赖利 1980）。然而，荷兰对欧洲经济现代化的最主要的和不朽的贡献就是为英国王室威廉·奥伦治的统治树立了榜样。威廉·奥伦治的统治时期的到来结束了荷兰式的现代国家财政原理的运用历史。17世纪末英国“金融革命”的核心就是出现了政府执法机构（国王和他的部长）和立法机构（议会）两权鼎立的局面。立法机构制定法规政策，而付诸实施需要经过议会的批准。正如诺思（North）和温格拉斯（Weingast）（1989）指出：这说明了这种劳动分工从交易费用的角度上讲是有利的，并

且将此机制运用于政府财政方面意义深远，发人深省。事实上，国家财政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不仅是提高了资本家对国家财政的信任，同样也促使了国家采用适当的金融手段对资本家进行强行征税。比如说，特许建立英格兰银行，创造了更富有流动性、更易于交易的政府债务工具，公开国家年度预算，建立、健全更加有效的中央政府控制的税收体制。（迪克森 1967；尼尔 1990；奥布莱恩 1998；布鲁尔 1989）。以诺思的话说，上述措施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是英国政府对其金融财政政策的稳定性所做出的一种“信贷承诺”，是符合英国资本家利益的。有很多理由可以证明这些变革为以后英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如最近的一份有关英国工业革命的调查报告中所评述的那样（迪恩 1996：23）：

英国（在 1707 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之后）国家金融政策改革的结果产生了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它加强了英国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使之有能力成功地抵御了当时席卷欧洲各国的金融危机；其次，日益猛增的巨大国债作为一种副产品，它直接为英国信贷机构的现代化、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和建立快捷有效的金融部门作出了贡献。

并且，拉里·尼尔（Larry Neal）最近进一步指出：政府债务风险的下降和流动性的增加使得其收益在全国范围内作为衡量私人投资者机会成本的越来越方便的指标（尼尔 1994：特别见 153-155，171-181；普雷斯赖尔 1960）。18

世纪数十年间的政府债务收益持续下跌促使了人们将投资方向“挤进”私营部门；同时，从表面上看，18世纪90年代开始的日益扩大的政府战时财政需求又暂时将那些投资“挤了出来”（艾什顿 1948；威廉森 1984；海曼斯和米罗瓦斯基 1987；以及莫克里 1987）。对这一观点长期存在着争议。<sup>①</sup>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挤出投资”现象的争论，但无疑英国在18世纪末的金融地位相对而言是占有优势的，其强大的实力可以与另一个当时的西方列强——法国的比较中显示出来。以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1984）的话说，从金融学的角度来讲，英国的金融革命要比法国早上一百年。金德尔伯格强调指出：约翰法银行计划的破产，密西西比州行骗案，以及接踵而至的1720年国家财政危机留给法国的遗产就是民众对国家银行和政府债务的信任危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大约一百年之后才得以扭转（卡梅伦 1967）。然而，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法国金融的大倒退不仅仅是以1720年的国家银行的倒闭为契机的，而应缘于以法国18世纪为代表的因循守旧的政府机构以及在此政府控制下的弊病重重的国家财政。我们回顾历史时看到，正是这些国家金融危机才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而在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统治时期沿用的国家金融体制仍然存在着不稳定的隐患（马里恩 1914 - 1933；怀特 1989；韦尔 1989；维尔德和维尔 1992）。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行的指券的作用就是那种金融体制不稳定性的最好佐证。本书中弗朗

---

<sup>①</sup> 此处应该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与“金融革命”相关的变化都促进了私人金融体系的进步。如1720年的“反行骗法案”就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使得英国银行业比起工业需要所提出的要求来说规模更小、体系更零乱。



索瓦·克鲁泽 (François Crouzet) 撰写的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指券的作用，也可以看到拿破仑精心策划的金融政策的出台就是这种遗产的一种反作用力，并且注定是要失败的。当然，这些反作用也应包括一些最有建设性的措施，比如说，建立法兰西银行。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对法国的货币银行体制具有巨大和深远影响的事情。19世纪法国金融体制的一个最明显的倾向就是聚敛金子和银子。即使这种倾向没有阻止法国工业化的进程，起码也减缓了这种进程。这种倾向源于19世纪初叶法国大众所采取的对政府直接财政需求的一系列短期反应。

对英法两国的比较似乎可以有力地支持“金融革命”的理念，而各种现代金融体制正是在这股主要动力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然而，从更广泛比较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比较会导致更多不同的见解，并且还特别为我们设置了两个重要的限制条件：首先，从一批成功的工业化国家金融体制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这一过程是逐步地，经过了不同的阶段来完成的，而不是一蹴而就，单一地向财政机制转变的。这种情形似乎与“金融革命”这一名词不相符合。第二，政府并没有仅仅通过财政和借贷机制去处理其自身的金融问题，进而对私人金融体制施加影响。它更多的是依靠行政手段、金融监管或放松监管来完成的。本书中搜集的大量文件可以说明这些局限性。从下述德国经验概况中我们可以很好地阐述上述所提到的第一种局限性。

我们可以从普鲁士这个德国最重要的一个诸侯国开始谈起。普鲁士“金融革命”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进入了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经历了很长一个时期，实际上贯穿了整个18

世纪。普鲁士霍恩佐伦州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较，它的金融理念仍旧是传统的，家长式的，即建立在过度节约的原则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以紧缩开支至仅足以维系其自身的生存为最低标准。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地方财产，维持其统治，并且避免交出某些州属权利以换取更大的征税权。<sup>①</sup>普鲁士于1806年在耶那的决定性的惨败摧毁了霍恩佐伦州，并且打破了统治者内部君主专制与地主贵族阶级（容克）和广大的农业生产者之间的权利平衡，使之进入了以普鲁士地主阶级为主的贵族统治时期。（少数城市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势力。）其结果是为了使经济从各阶级合作的，半封建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比如，通过废黜农奴制，建立中央集权，亦即以牺牲新普鲁士贵族（容克）为代价，（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以牺牲专制统治为代价）加强中央政府的官僚主义政治统治。然而，所采取的这些金融措施，如新的税收政策，从个体商人和银行家手里借款直到在1815年战争取得胜利后才产生较大的效果。总之，他们提出的议会对政府财政的监控仅仅是停留在口头承诺上，而并未提出具体的措施。此外，1810年、1818年和1820年主要的贷款实际上还是通过传统的途径与国外罗思柴尔兹家族的银行家们签约而筹措到的。这些贷款并不是向当地资本投资者筹措资金的一种新的策略。<sup>②</sup>事实上，无人真正知晓普鲁士这些

① 有关这一点，请参阅布朗（1975）的精辟见解。

② 尽管这一阶层在此期间逐渐兴起，正如1815—1840年间金融活动的大量增加（包括在柏林资本市场外国证券的上市交易）表明了这一点。关于这点参阅布洛克海基（Brochhage）1910和博查特1961。同时也请参阅海·西斯勒（Schissler）所撰写的文章以及由她和海·乌·韦利尔（H.-U. Wehler）在《普鲁士金融政治1806—1810》上所编辑的文件（凯尔1984）。